

● 中国近现代史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

朱 洪

(安庆师范学院 皖江文化研究中心, 安徽 安庆 246003)

[作者简介] 朱 洪(1957-), 男, 安徽桐城人, 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作家,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和人物研究。

[摘 要] 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 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思想上, “少共”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战胜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 组织上, 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先进青年转向了共产主义事业, 其中, 大多数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 旅欧少年共产党; 赵世炎; 周恩来; 陈延年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6 \ | 0721-05

一、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起源于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煜瀛)20世纪初在法国设立豆腐公司^[1](第5页)。

为了鼓动中国青年到外国打工、学习, 蔡元培等于1916年3月29日在巴黎成立华法教育会^[2](第73页)。欧战结束后, 在“工读”、“劳工神圣”等新思潮的鼓荡下, 勤工俭学成了潮流, 青年人争先恐后, 纷纷出国。自1919年3月第一批赴法, 1920年华法教育会名册上勤工俭学的人数增加到2000人, 每月平均超过100人^[1](第110页)。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船一船地抵达法国, 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影响。日本《外交时报》刊登美国人蒲朗逊利发表的文章说:“年来, 中国学生赴法, 每月平均百五十名。法之船公司, 特低其船价, 法之朝野, 复乐一援助云。”^[3](第100页)美国的许多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 主张向法国人学习, 开禁华人。

到巴黎当月, 陈延年给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朋友丁肇青(即雄东)写信说:“学费每季二百五十佛郎。弟预备明年或今年10月间投考巴黎大学, 拟经过该大学所设之PCN班, 然后再入分科, 盖弟欲受完全正式之系统教育也, 兄以为迂腐否? 校内不能住宿, 现在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三十二号租一间楼房, 每月一百二十佛郎, 屋内有现成的瓦斯炉, 故自己弄饭吃, 比在外边吃省得多。现在巴黎生活程度, 每月至少要五百佛郎, 乡间则较省俭, 每月至少也花二百多三百佛郎。”^[3](第202页)这封信反映了一部分勤工俭学学生初到巴黎后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勤工俭学在国内蔚然成风后, 危机随即到来。勤工俭学的学生出国时, 审查不严, 有的学生一句法语不懂, 有的身体软弱无力, 有的只十五六岁, 很多人没有学习技能。此外, 规定每个勤工俭学的青年需要带三五千法郎, 作为其失业时的维持费。但一般勤工俭学学生只带了3000法郎, 甚至也有一钱不名的。加上当时法国经济萧条, 不需要增加工人, 和出国前的分析完全相反, 许多学生经济困难每月坐领400法郎维持费^[1](第9页)。

蔡元培于1921年1月2日到巴黎后, 以中华教育会会长名义发表通告说:“欲矫此误, 惟有俭学会、

勤工俭学会对于华法教育会为部分之分立,由两会学生自行分别组织,华法教育会从旁襄一切。”(第13页)表示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是两回事,不再对勤工俭学学生的困难负责。4天后,蔡元培再次发布“通告”说:“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第14页)1921年2月27日,李维汉、赵世炎、罗学瓚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根据各代表的要求,在巴黎大咖啡馆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参加了会议^[4](第15页)。第二天,4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领导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求学和发放救济金等问题。法国当局派出上百名警察以及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陈延年和陈乔年是半官费生,没有参加请愿活动。李立三、赵世炎因不同意请愿,均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二、陈延年和陈乔年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延年和陈乔年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因是:

(一) 争夺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的影响

1921年9月间落成的里昂中法大学发出通告,拒绝已经到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入学,另从国内招收新生。针对吴稚晖带120多位学生9月25日进驻里大,勤工俭学学生9月17日作出决定:(1)誓死争回里大;(2)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3)绝对不承认考试^[1](第67页)。9月21日,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5人组成的“先发队”,由巴黎乘火车到里昂。在中国驻法公使陈嘉謨支持下,法国当局次日出动武装警察,把“先发队”一百余名成员囚禁,10月14日,蔡和森等104人押往马赛,乘船回国^[1](第78页)。

1922年3月21日,勤工俭学学生李鹤龄枪击陈嘉謨未遂,自请入狱。这也是里昂大学风波后最激烈的事件。李鹤龄和陈延年、陈乔年同在工余社,因痛感无政府主义不能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毅然抛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采取激烈的武力行动^[4](第18页)。李鹤龄刺杀陈嘉謨事件对陈延年、陈乔年震动很大,他们开始思考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寻找新的道路。

(二) 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等的帮助

从陈延年主编的《工余》上,赵世炎发现陈延年和陈乔年的思想发生了变化。1922年4月26日,赵世炎给无名(陈公培)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设法争取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事:“李合林(注:鹤龄)事后,安那其朋友奋然而起。但以我观察,有一部分之安那其倾向颇变。其最著者为大陈——延年——趋向极为可爱,近日他们所出的《工余》杂志,竟高呼暗杀……革命……气魄可钦,惜我与二陈均无接洽,你可否还来一信,与之问讯,且探其动静。因安那其中颇有人,近来最爱刻薄骂人,将来如生冲突,亦麻烦,可厌事也。”^[5](第836-837页)“安那其”即指无政府主义者。几天后,赵世炎在给陈公培回信中又说:“法国旧时安那其如二陈等近时倾向大变,望你们有私人关系者,速来接洽(即以青年团为题)。”(第839页)

周恩来对陈延年和陈乔年等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动向及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在这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聂荣臻回忆说:“由于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们终于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像陈延年、陈乔年同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赵世炎、周恩来、陈公培等人的热心帮助下,1922年初夏,陈延年和陈乔年阅读了法国共产党印刷的《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小册子,完成了由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给赵世炎写信表示,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青年团中央尽快联系上,解决归属问题^[3](第843页)。陈独秀还提议,旅欧少年共产党派一部分同志到莫斯科留学,并帮助他们与苏联接洽,解决签证问题。

接到陈独秀信后,赵世炎、周恩来等立即致函陈独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赵世炎和周恩来、陈延年等酝酿第一批赴苏留学名单。

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于1923年2月17日,在塞纳河畔巴黎西郊布洛宜森林西边——区比扬古镇(Billancourt)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举行了“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42人代表了72人参加。大会由赵世炎主持,任卓宣、薛世纶、赵光宸、穆清作记录。大会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成员。考虑赵世炎、陈延年等即将到莫斯科去留学,大会选举了周恩来、任卓宣、尹宽、汪泽楷、肖朴生5人为委员,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为候补委员,并推选周恩来接替赵世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尹宽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了张申府的工作。

陈独秀1923年1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国后,召开中央局会议,批准了李维汉带回来的少年共产党关于“归属”团中央的报告^[8](第183页)。3月中旬,周恩来在巴黎给国内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了一份长篇报告,详细汇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选会议的情况。报告写到一半,收到1月29日中共中央答复李维汉带回国内的报告,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第57页)。周恩来写道:“我们看着后,真欣喜无量!”^[8](第847页)

五、与旅欧少年共产党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蔡和森对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有过积极的影响

蔡和森由于参加争夺里昂大学的斗争,1921年10月被驱逐回国,以至没有参加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但他作了许多酝酿工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9](第68页)。郑超麟回忆:1921年春,赵世炎曾写信给蔡和森,建议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同意组织,但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名称。1921年夏天,蔡和森参加了“工学世界社”大会,提出组织“少年共产党”,遭到部分人反对,蔡和森的意见未被通过。

(二)陈延年、陈乔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对壮大旅欧共产党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陈延年参加少年共产党后,国内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1923年第二期《互助月刊》发表《同志消息》:“法国之《工余》杂志,为吾党旅法之机关报,前为陈延年编辑,近陈君改变为共产党,编辑事务改由李卓君担任矣。”^[4](第17页)中国无政府主义党南洋支部曾发通告,大骂陈延年是“叛徒”,“投降”了共产党^[4](第22页)。由于陈延年、陈乔年转向马克思主义,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受到致命打击。

(三)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对邓小平等转向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6月下旬,邓小平(邓希贤)在法国蒙达尼郊外,与蔡畅等人一道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邓小平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最先是因为结识老乡聂荣臻,接着结识了开小书店的陈延年和陈乔年,随后又在工厂打工时结识了赵世炎和王若飞,后又结识了周恩来,并被这些先进青年理想和精神所吸引。据《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载,邓小平曾说:“我在法国的5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4年左右(其余1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和汪泽楷两人。”

陈延年和陈乔年赴苏留学后,邓希贤和李富春调入《少年》编辑部,在周恩来等领导下编辑出版少共中央杂志。后考虑陈独秀等建议停办《少年》,周恩来、邓小平等将《少年》更名为《赤光》继续出版,新的刊物仍然由邓小平等编辑、印刷。

(四)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参加法共情况

1922年秋天,经法共党员、越南马克思主义者阮爱国(即后任越共总书记的胡志明)介绍,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肖三和陈乔年5个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4](第23页)。在巴黎十三区(注:一说“十七区”)过组织生活,交党费。根据郑超麟回忆,尹宽曾告诉他,他也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但此段历史情况和张申府等5人共产党小组的情况有出入,值得进一步研究。

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思想上,“少共”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组织上,“少共”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先进青年转向了共产主义事业,如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邓小平(邓希贤)、李富春、蔡畅、熊锐等,其中除少数人,如郑超麟、尹宽、汪泽楷等后来参加托派活动,分道扬镳外,大多数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参 考 文 献]

- [1]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 [2] 张允侯,殷叙彝,李峻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3]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上)[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4] 黎显衡,等. 陈延年[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 [5]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下)[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6] 周恩来年谱(1898—1949)[Z].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7] 张申府. 张申府散文[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 [8] 唐宝林,林茂生. 陈独秀年谱[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9] 金冲及. 毛泽东传: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0] 水 如. 陈独秀书信集[C].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桂 莉)

French Part-time Foreign Students' Movement & Foundation of Young Communist Party in Europe

ZHU Hong

(Anhui Jiangxi Culture Study Centre,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003 Anhui, China)

Biography: ZHU Hong(1957-), male, Professor,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majoring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people.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Young Communist Party in Europe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deology, it's given wide publicity to Maxism and defeated such trends of thoughts as Anarchism while in organization it's attracted and united a good many advanced youths to begin to fight for their communist ideals and mos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beration cause of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Young Communist Party in Europe; ZHAO Shi-yan; ZHOU En-lai; CHEN Yan-nian